



西方左翼思想家的反偶像批判传统及其重建^{*}

祁程^{**}

为应对“乌托邦之死”语境下处于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美国左翼思想家雅各比吸取犹太传统资源，作为其知识分子思想与反偶像崇拜思想的理论支撑之一。他通过揭示犹太传统乌托邦思想中的弥赛亚情结，并经创造性的加工改造后，形成了一种具有革命维度的当代弥赛亚版本。这种犹太政治革新的自由价值取向，与多数犹太西方左翼思想家的理论旨归之间，保持高度的相似性，甚至达到与其“革命如何可能”要旨的一致性。雅各比梳理了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家在理性化陈述立场的背后隐藏着的犹太精神气质与文化潜流，通过挖掘犹太文化中的反偶像崇拜传统，用西方左翼文化批判的声音清除意识形态偶像，使得犹太偶像批判传统与当代乌托邦思想之间，形成双向融合与互动的过程，进而对当代乌托邦转向与重建的具体内容加以阐释，提供了处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新的思考方式。

乌托邦在如今的话语空间与地位每况愈下，西方左翼思想家们往往吸取犹太传统资源作为理论支撑，渴望为乌托邦找到现时代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他所希望乌托邦范式的关注点，既不同于宗教的来世关怀而更在乎现世今生，同时有能在犹太传统文化精髓中挖掘到谛听未来的声音。

西方左翼思想家在理性化陈述立场的背后，隐藏着强大的犹太精神气质与文化潜流，为进一步坐实所依托反偶像崇拜理论资源，一方面不断为犹太民族主

^{*} 本文是国家哲社基金重大项目“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与前景研究”(16ZDA001)、上海哲社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专项)“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进程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2018WLL008)的阶段性成果。

^{**} 祁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等。

义的文化传承作出努力,另一方面力图摆脱神秘主义面纱来为社会现实批判呐喊助阵。雅各比认识到,对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批判,作为一种带有犹太传统的“神学批判”,源自乌托邦精神的复兴,将复活冬眠中的社会政治想象力。

一、犹太传统乌托邦思想中的弥赛亚情结^①

犹太文化传统中有记载的偶像崇拜,始自先祖亚伯拉罕时期。而犹太传统中禁止偶像崇拜,特别是在《圣经旧约》里,十诫中的第二诫直指偶像崇拜,对于信徒来说,上帝是绝对的全知全能者,不可被语词质疑,更不可以图像的方式显现,不能通过视觉感官所触及,而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被聆听。为高高在上的上帝塑造偶像,无疑是一种几乎致命的不尊与亵渎。“拒绝描绘上帝逐渐变成了拒绝描绘乌托邦……正如反对直呼上帝之名一样,不愿意描述乌托邦也不会贬损而只会提升它的地位。”^②犹太传统里,面对至高无上的上帝,是无法言说的。不要试图用语言直接读出上帝,因为如此的语词来解读操作,就会使得自身在未来所拥有的份额损耗或流失。

《圣经旧约》对反偶像崇拜的理解,仍是较为原始的文化解读,而雅各比则深化了对反偶像崇拜的认识。“最切实可行而或许又是最简洁的描述犹太人的方式——从神学角度来定义——可能是从反面来体现:犹太人是规避偶像的人。”^③雅各比借兰道尔之口指出,犹太思想家的未来理想,只能在人类解放的大背景下实现,与人类一起被拯救,“在驱逐与流放中等待弥赛亚,等待成为人民的弥赛亚”^④。犹太教传统中弥赛亚的时间序列,倾向于通过较小的调整来全面改变世界。弥撒亚与“Tikkun”这一希伯来概念息息相关。这一概念背后所映现的世界观,被雅各比从肖勒姆文本发现了所具有鲜明的指向性,“这一 Tikkun 的世界观就是弥赛亚革新的乌托邦世界,其间一切污点被排除,一切邪恶被打败”^⑤。雅各比欣赏本雅明所阐释的弥赛亚时间观,这一时间观将弥赛亚与革新的乌托邦勾连了起来。本雅明引用克利的画作描绘了一个“历史的天使”的形

^① 弥赛亚,又称“救世主”,是“Messiah”的音译,来源于中古拉丁语的“Messias”,后者又是从古希腊文的“Meooms”转译过来的。再往前追溯,希腊语中的这个词来自古代阿拉姆语“Meshiha”,希伯来语将其译为“Hamashiah”。在希伯来语里,原义被解释为“受膏者”,泛指被授予神圣使命的人。参见傅有德:《犹太教的弥赛亚观及其与基督教的分歧》,《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2期。

^② [美]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姚建彬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③ White Edmund, “Images of a Mind Thinking,” Harold Bloom, *Modern Critical Views Cynthia Ozick*,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6, p. 127.

^④ [美]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第131页。

^⑤ 参见[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才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象,可以看作是过去对当下的救赎。他以此来批驳历史主义者身上所固有的线性时间观,也就是同质的、空洞的时间,认为连续流淌的时间是可以被爆破的,当下可以跳跃回过去,同样,过去也可以在当下复现,把特定的一段过去从过去的整体中剥离出来,使之在当下复现。时间进程的意义,在于阻断时间向空间折返。历史进程中的任一瞬,都彰显其独立的意义,从而对抗自身终极目标的出现。更重要的是,在于体现一种“终末的时间”。

在雅各比看来,弥赛亚的踪迹,能够在它彻底的对立面中被发现,在无尽的灾难中体现出世俗性,意味着将带来不再强调现存之物基础之上的普遍性替换,而这种彻底性的变化方式,也意味着崭新世界的创造与生成。终末,是超越对现存之物的改善,而建构起一个人与上帝、自然、社会及与人自身等多重关系融洽而处的时代境界。尽管犹太教形态随着历史发展几经变化,施行全人类救赎的“千年王国”理想却得以传承与发展。弥赛亚是犹太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不止一种宗教吸收和借鉴了这一文化资源,涉及对弥赛亚观念的理论诠释。而后犹太知识分子将其复制加工,形成当代意义的新型版本。^①

二、犹太弥赛亚主义的转型

20世纪欧洲犹太知识分子的复国主义与返乡思潮掀起,特别是左翼犹太学者,其内心所升腾的“犹太弥赛亚主义”,既延续了政治理想与民族复兴合璧的传统,又将知识分子建构的乌托邦精神与政治革命与人类解放交融在一起。犹太左翼思想家心目中的“犹太弥赛亚主义”,已通过了理论上的嫁接与部分的内容替换,其移植了深厚的政治底色,形成了一种具有革命维度的弥赛亚版本。^②这种犹太政治革新的自由价值取向,与大多数犹太西方左翼思想家的理论旨归之间,保持了高度的相似性,甚至达到了与其“革命如何可能”要旨的一致性。

其中,既凸显了通往犹太古代神圣事业的复归梦,又呈现出未来千年王国的乌托邦理想诉求表达。新型弥赛亚的要旨,不再追求上帝或原始神灵的救赎路径,也不是个人意义上的自我拯救,更不在于为了无意义的磨损时间来消耗等待的力量,而是存在于秉持革命的救赎路径,同时依靠至善的价值指导与规划,来探寻集体解救的可能性,更是正视可能的末世论灾难并由此明晰时间的真正意

^① Gershom Scholom, *Major Trends in Jewish Mysticism*, London: Thams and Hudson, 1968, p. 286.

^② 马克斯·韦伯从历史角度指出,这是一种古以色列人阻止自己被同化的文化策略,而至于这种崇拜为何会选择一种无神像的形式,韦伯推测,可能是因为犹太民族在该崇拜起源之初还不具有成熟的造型技能,但他也指出了这种无形崇拜增强了神的尊严和可畏。参见[德]马克斯·韦伯:《古犹太教》,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5页。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6辑

义,通过人类的自我解救与自我创造,达到对新的未来世界的想象与建构。

20世纪初叶,整个欧洲陷入了革命主体性危机的情状之中,如何摆脱这一危机的重负,并及时从中突围,成为当时的时代理论与实践难题,而这一话题的切换,就在于对革命主体的力量把握与革命主体精神的重建。革命主体性的危机在柯尔施看来,乃是马克思主义处于低潮与困难局面的主要表现形式。犹太左翼思想家们,为了找到解答这一问题框架的出口,做了种种努力,不仅希望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传统中找到总体性的解决方案,而且希望能从早期犹太传统的末世论话语体系寻找相关解答资源。晚年恩格斯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中曾试图探寻早期基督教中的末世论资源,以解决合法化的工人革命运动积极性缺乏与革命性不足的问题。他们认识到了犹太传统资源中的革命因子,试图填充孤立无援的社会个体与无产阶级革命普遍性之间这一已经存在的隐性鸿沟,以求解答个人自由目标与革命方式手段的悖论问题。犹太左翼思想家的内心都有不同程度的弥赛亚宗教情结,他们对欧洲的希腊理性主义传统抱有某种不信任的态度,把反乌托邦主义兴起后给乌托邦带来灾难的重建方式,交付于犹太希伯来文化传统。在犹太话语的新型历史观改造中,用新型弥赛亚历史,即复归犹太古代神圣事业的过去,与未来千年王国的乌托邦理想的未来相结合,替换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神话,在新的历史观关照下,形成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考察与认知的弥赛亚主义时间框架。

革命主体性的建构要能获得历史性的突破,就在于把集体的革命意志做实,通过个体的力量激发,组合不同个体的伦理与革命实践,进而达到革命集体的建设与再建构;同时,不同个体的伦理实践,在带有普遍性的集体行动中,激发出进步统一的力量。犹太教义里一直延续的人本主义精神,也主张上帝的信仰表达,将通过人的不断奋斗与伦理实践得以实现,廓清现存于概念思维中的形而上学化或神化处理,从而和世俗生活里的虚假意识形态划清界限。如此,我们与世界才能形成共生关系,寻找一种非宰制的可能性空间,进而重新思考革命主体的力量把握与革命主体精神的重建。

20世纪的弥赛亚主义,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到处设置的意识形态陷阱,与现代权力机器体系肆意扩散的权力宰制,尽情加以控诉。犹太左翼思想家们,也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整体状况、经济模式、政治架构、大众文化、社会心理、等进行深入批判。犹太弥赛亚主义与当代乌托邦之间,在“革命如何可能”的要旨贯穿中,形成了彼此逻辑上的紧密关联。雅各比正是看到了犹太传统与犹太左翼思想家的理论资源之间的复杂关联性,才有尝试以“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这一命题,还原犹太弥赛亚主义与革命的乌托邦的关系。具有反抗行动与批判精神的犹太弥赛亚神学,以信仰实践为基础,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之间,形成罗威所



言的选择性亲和关系。借助犹太弥赛亚思想中一直有尊崇个人存在与他人存在的共在性传统,形成“完全他者”的乌托邦追求,一方面破除必然王国的体制桎梏,一方面图绘自由王国的非蓝图式未来。

三、西方左翼的反偶像崇拜思想与犹太传统的关联性

西方左翼学者雅各比在对犹太文化背景的左翼思想家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当代乌托邦思想中包含有犹太弥赛亚主义的维度。乌托邦之革命性、批判性与否定性之维度,在犹太知识分子思想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由此,雅各比将布洛赫、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兰道尔等人称之为“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者”。他认为这一批思想家传承了犹太偶像戒律传统,同时又开创了新的反偶像崇拜形式与内容,他们拒斥对未来社会细节的精致描画,也反对现代图像化与过度视觉化的处理。“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思想家都是反对潮流的乌托邦主义者,他们并不屈从于日常生活的现存状况。”^①这种乌托邦新的把握,使之与蓝图派乌托邦主义者鲜明地区分开来。

雅各比以 19 世纪美国的犹太裔记者莫迪凯·诺亚的《乘船去乌托邦》作为梳理的首站。诺亚在文中把名为阿那纳(又译为亚拉腊)的乌托邦公社,视作全世界犹太人受迫害后的避难所,这种尝试以一种轮廓式的想象出场。这一乌托邦想象敢于面对质疑,即在一些人看来,除了上帝之外不能有人提出任何政治民族国家重组的计划企图。但在雅各比看来,不需要以完全清晰的迹象告知世界,对社会正义和历史远景的追求,不等于要对乌托邦远景做详尽描绘。诺亚的理论冒险恰恰是以设计的公社,做出一种先锋性的激进姿态,而不是制作完善的蓝图。

雅各比认为,1896 年特奥多·赫茨尔在创作犹太复国主义奠基作品《犹太国》的过程中,力图避开传统乌托邦的恶名,省却很多幻想式的细节,而注重带有实践性后果的实践愿景,其中极个别的计划片段,也没有告诉读者如何将之具体化处理。但雅各比指出,其之后创作的《新故土》则带有明显的贝拉米《回顾》的蓝图派印迹。1899 年,H. 佩雷拉·门德斯的《前瞻》几乎没有为新的犹太国家复兴提供任何细节,尽管涉及采用政治策略达到目的,但对于国家生活以及政府管理、经济运行的实质问题,均未传递明确解决路径的信息。阿哈德·哈姆表述的犹太复国主义倾向,呈现出与后期赫茨尔《新故土》明显的界限划分。比赫茨尔寄希望于西方的欧洲犹太复国主义更具有东方性的特质,也就是说科技化与

^① [美]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第 12 页。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6辑

过度实用化的痕迹不是太明显。这种特质所要求的并非是政治上事无巨细的庇护要求,而是文化与精神上的复兴。

在雅各比看来,哲学家马丁·布伯延续了阿哈德·哈姆的哲学立场,同样在未来构想上维护对犹太精神的复兴,呼唤超越日常理解的信仰理性化与教义简单化,这种预言式的犹太精神开启的是回归与变革两个向度。自1899年遇见兰道尔,到1949年发表《乌托邦中的道路》,从神秘主义转到了社会思想,就政治性而言,有着对未来的世俗渴望,而就犹太性而言,又拒绝对未来进行过分简单化与非历史性的描画。正如雅各比所言,“布伯的乌托邦唯灵论可见于其与‘新社会’集团的最初相遇”^①。布伯所理解的“新”,是一种不同于旧社会僵死的经济与文化宗教结构,它打开生活之源的同时,对整个生活满怀向往的表达。新社会产生在新的社会根基上,对革命的理解也不同于以往,其本身就是弥赛亚式的乌托邦革命。雅各比认为布伯反对纯粹的科技乌托邦形式,致力于描绘完美社会结构的蓝图乌托邦,极容易变成束缚人思想与人类交往的体制。布伯高度重视人类交往的和亲善关系,由此赞同共同体的培育。在布伯那里,对乌托邦共同体或公社的探讨,乃是一次没有失败的实验或一个卓越的非失败,这种理想的动机是散漫而圆通的。“他们把创造新人类和新世界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这一切并没有被僵化成一套凡俗的程序。这些人并没有像历史上任何别的合作居民点的居民那样,随身携带着他们的规划。”^②雅各比透过布伯在著作中对古斯塔夫·兰道尔的敬意,指出兰道尔一直致力于复兴真正的公社精神,这类乌托邦的共同基础在于,并非建立地理意义上的国家,也不是建立新的政治机构,而是对人际关系加以松绑使之获得更新,未来的希望需要避免固定模式的解决方案,不让僵化威胁到未来的鲜活和激情。个体应当深入发现自身、研究自身,来呼唤新的社会共同体生活,犹太人应接近自身的传统,使得更为广泛的社会团体获得新生,以至通向人类的革命与重生。兰道尔1907年发表的《革命》将革命视作一个微观世界,试图将文化或精神引入乌托邦政治建构之中,社会主义意味着实践与精神的双重统一,与人类生活为之关联。雅各比认为,他与恩斯特·布洛赫一样利用了犹太教资源并与革命巧妙混合,怀着神秘的希望期待关乎未来理想的真理能够传播并改造社会。兰道尔的乌托邦超越了无政府主义和神秘主义框架,得出现实乃是超越此时此地的判断,“反对仅仅将视革命为一个新的国家或者新的经济秩序的观念”^③。乌托邦在他那里,不是公用的厨房,而是对个体关系达

① [美]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第125页。

② Martin Buber, *The Road in Utopia*,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42-143.

③ [美]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第135页。



成的文化融洽表示极高的热忱与敬意。“我不会说,正如某些人迫切希望的那样,我们期望的崭新现实应如何被构成一个整体。我没有刻画理想,没有描绘乌托邦。”^①兰道尔相信今天的生活塑造着明天的生活,这种塑造并不意味着庸俗的宣告和建筑某种蓝图。兰道尔甚至怀疑构想乌托邦的重要手段语言,以此表达对描绘未来的抗拒。他认为文字不完美的传达了人类的希望,却难以准确表达乌托邦冲动。乌托邦应逃脱语言的束缚,摆脱书面语言这种属于统治与支配的领域。

雅各比文本中所指认的蓝图派的乌托邦,在这里仅仅作为一种语言的构建而存在,存在于所谓的“矛盾与牢固的具体化”领域。“我所谓的社会主义并非尽善尽美。我不相信这样的尽善尽美。”^②“兰道尔在其对书面语的怀疑以及对未来的沉默中提供了一个犹太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思想例证,它烙上了忠于禁止偶像的圣经戒律的印记。”^③雅各比认为,兰道尔展现出了对僵化语言与僵化传统真理的怀疑,这种极具破坏力的怀疑色彩的背后,是对未来无法言表的展望。“对于兰道尔来说,生活先于语言并且取代了语言。”^④当梦想被抛入词语之中,最美好的部分可能就被摧毁遭到破坏。

犹太左翼思想家的意识形态批判中,能或隐或现地觅到犹太弥赛亚主义和偶像禁令的踪迹。^⑤无论是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的经典语录,还是布洛赫借用音乐等艺术话语方式表达乌托邦理想,都可视为反偶像崇拜在政治视野中对乌托邦合法性的表达,而乌托邦合法性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偶像拜物教进行反抗,以及由此衍生的景观世界批判和大众文化符号崇拜反制,都意味着一种渗透反偶像崇拜因素的当代乌托邦构想,为其提供理论视野与价值支撑,与传统蓝图派反向而行的当代乌托邦,基于其反偶像性质,把阿多诺的非体系的体系性,表达得淋漓尽致。

具有犹太血统的左翼思想家,从欧洲文化困境之后转向超越性的犹太资源,强调犹太文化资源在乌托邦研究视域中的作用。在历史唯物主义内部,介入与吸收犹太弥赛亚主义的理论资源,一定程度上在于唤醒革命理论内在的停滞,也能够从另一理论视角填补革命能动性出现的空白,与面临的未来革命可能性发

① Gustav Landauer, *To Defend Socialism*, D. J. Parente, Thailand Taraz Press, 1978, p. 44.

② Gustav Landauer, *God and Socialism, the Future of Mankind: Life and Literary Essays*, Teggart Diego Berwin: Pandora Press, 1977, p. 33.

③ [美]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第137页。

④ [美]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第143页。

⑤ 霍克海姆曾指出,他与阿多诺共同发展起来的整个批判理论都源于这一禁令。参见[美]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第171页。

生问题。当然,肖勒姆清醒地认识到,世俗运动与弥赛亚信念盲目结合后可能所致的危险:“我认为,未能区分弥赛亚主义和世俗运动,容易导致这些运动受挫。这样的融合变成了一种毁灭性的因素。对弥赛亚术语的滥用给献身于那些世俗运动的人的精神和自我意象输入了错误的暗示。”^①但就整体而言,当传统形而上学体系被各方所质疑,当代乌托邦的精神建构被实证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所批判,当代乌托邦与犹太文化的联盟,这一革命性理论武器的一般框架建立,能够促动思想家对新型乌托邦理论的哲学思考。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者进行的思想探索,绝不是单单为超越现时代而盲目地越界,也绝非为实现未来形式上的某种可能性而进行理论的变异。它提供了一面让思想家认清所处时代真相的镜子,并从镜子处超越本身,克服原有的视野局限,促发思想本身对未来社会理想的内在超越。犹太文化与革命乌托邦相融合的精神潜流,在犹太西方左翼思想家的乌托邦探索历程中穿行。

四、由犹太思想资源切入的当代乌托邦重建

西方左翼思想家通过重新梳理犹太文化中的反偶像崇拜传统,以试图用批判的声音去清除意识形态偶像。^②以观念为前提的“科学”或无意识体系,试图系统地解释世界甚至控制世界时,就成了当代社会误解与抵制乌托邦的瓶颈。如何让世界挣脱桎梏,正是雅各比在梳理过程中需要回答的问题。

表面上看,犹太传统无涉于世俗政治领域,实则其内在地超越维度,为革命阶级及其思想家们颠覆现存秩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未来想象空间。“这个世界既非永恒的也非不变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而其现世的秩序乃是人类的所作所为尤其是犹太人的所作所为的产物,也是神对于其作为的应的结果,换言之,现世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而且注定要回复到真正为神所喜的状态。”^③雅各比在此基础上,承接了对犹太资源与革命乌托邦两种不同文化构型之间的关系勾连。带有复兴精神的犹太文化与革命乌托邦具有结构同源性。绝大多数拥有德国文化背景的犹太西方左翼思想家,提供的两种解答文化危机的路径,即回归历史之根以传承文化精神,或唤醒普世主义的革命乌托邦精神。犹太文化中的弥赛亚主义,内含有相辅相成的辩证法,虽然表面上看,是复归与乌托邦两种时间

^① Gershom Scholem, *On Jews and Judaism in Crisi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6, p. 26.

^② 即某种所谓思想科学演变成的观念崇拜,因为它会成为另一种蒙蔽现实的图像,表明理性的显现可能比谬论更晦暗,更难以把握。而且它的神秘化力量如此隐蔽,以至逻辑的艺术不足以去神秘化。参见 Emmanuel Levinas, *Ideology and Idealism*, in *The Levinas Reader*, edited by Seán Hand, Cambridge: Blackwell, 1989.

^③ [德] 马克斯·韦伯:《古犹太教》,第14页。



性上相悖的倾向。前者是为了还原昔日的犹太黄金时代,像早已随历史而逝的理想国度与伊甸乐园回归;后者希冀尚未出现过的指向美好未来的崭新世界。“即便在复归的力量中也存在着乌托邦的因素,在乌托邦主义中复归因素同样发生作用。彻底的新秩序拥有旧世界的成分,旧世界也是在乌托邦梦想之光的普照之下对昔日现实的转换和升级。”^①

犹太弥赛亚主义的二元性,是犹太知识分子思想传承的重要特征。这种二元特征从一方面看,向往未来,而另一方面又回望过去而不愿冒险,从犹太西方左翼思想家的理论生成历程就能清晰地显示:“几十年来,法兰克福学派谈及甚微;但并不只是单个人的失误,如果他们的语言和概念缺乏政治影响的话。无家可归的德国犹太流亡者的情形是不鼓励大胆。”^②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思想,同样存有复归与乌托邦的二元性。以反制新自由主义并又反极权与反独裁为二元的典型特征。对于古斯塔夫·兰道尔等人而言,革命的乌托邦,一方面伴随对前资本主义文明与古代农村社区的回归,另一方面将指向过去的浪漫主义纳入整体的未来理想构思。“他们不仅恪守关于偶像的禁忌,而且还在对未来可能是什么保持沉默的边缘摇摆不定。”^③具有同源结构的反偶像崇拜与革命乌托邦,将激进革命倾向的社会思想,转换成了对当代乌托邦精神的建构。

犹太教传统中,当下完成救赎,也就是弥赛亚的使命,而弥赛亚的到来,往往意味着灾难的同步降临。如何在历史性的当下,与弥赛亚未来形成有效连接,就要跨越总体性堕落的现世和作为必然历史事件到来的救赎,弥合两者间的历史鸿沟,如此,未来的弥赛亚才会降临。“这一理论强调的是从每一历史性的当下向弥赛亚的未来之转变过程中的革命性灾难元素。”^④通过革命对现存秩序的彻底毁灭与消解,才能摆脱线性历史时间中的进步历史步调,由此在开辟革命性灾难启示录的同时,通往弥赛亚救赎之路。犹太弥赛亚主义取代自启蒙运动以来宣扬永恒进步的理性乌托邦,并在雅各比的促成下与当代乌托邦实现合流。“犹太传统的真正继承人是我们这个世纪的那些最重要的革命弥赛亚主义理论家:恩斯特·布洛赫,瓦尔特·本雅明,西奥多·阿多诺与赫伯特·马尔库塞等。”^⑤

① Gershom Scholem,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Messianic Idea in Judaism,” in *The Messianic Idea in Judaism*, trans. Michael A. Meyer,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1, p. 4.

② Jacoby, *Dialectic of Defeat: Contours of Western Marx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14.

③ [美]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序第12页。

④ Gershom Scholem,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Messianic Idea in Judaism,” in *The Messianic Idea in Judaism*, p. 7.

⑤ Gershom Scholem, *On Jews and Judaism in Crisi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6, p. 287.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6辑

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传统,不仅表现出对现存状况的超越性与批判性,更重要的是清醒地认清现存秩序与超越性之间的距离,通过对图像化与视觉中心主义、学院化与专业化体制、功利主义大众文化与多元文化主义三大偶像所做的批判,总括其思想所隐含的三条线索——视觉图像、文化研究、和学院体制化,并力求诉诸社会实践还原当代乌托邦所展示的新型历史意识,以此在某个阶段或者局部乃至全部,击碎现存状况的偶像藩篱。而不是一味抬高,甚至批判当时占优势的现象与事物,否则就会导致乌托邦运动的毁灭性灾难。“现存秩序与乌托邦之间的鸿沟,在革命理论家那里得到了清晰的界定。与充满意义的时代形成鲜明对比并极具殊异性的是意义匮乏的时代:任何进步或进化的可能性被彻底否定,革命被视为对现存世界的闯入。”^①革命的乌托邦不仅指向对旧世界偶像的极端否定,也不仅是对原有偶像的彻底变更,而更多地指向改造,而且指向对新世界之现实的具体内容的建构。

犹太传统与乌托邦理论的融合,形成了哲学意义上的一股清新的无政府主义微风。这股微风贯穿了犹太传统“既非上帝又非主人”的文化观念,其内在具有的当代反偶像崇拜立场,表达了对权威的鲜明态度,即对一切神圣或世俗权威的消解,颠覆性呈现出推翻现世权威控制的效果。^②末世论系统神学家雅各布·陶伯斯认为,神权政治在犹太传统的话语体系中,所依照的是无政府主义的灵性基础。人类从一切世俗限制中解放自身,并与降临的上帝订立契约,以绝对信仰为唯一要件,来企图摆脱统治者的束缚。“一方面,重新发现犹太教,确切地说,是弥赛亚的复归/乌托邦之维,另一方面,认同革命的乌托邦。”^③他们拒绝资本主义强烈的文化同化,力求重新发现犹太文化,达到在历史遗忘之中的拯救与复兴。去世俗化、反同化、再文化化,成为鲜明的反偶像崇拜的文化气质和传播符号,犹太文化内在传承的非理性、反习俗、神秘主义、反资产阶级的历史遗产得以重现。具备浪漫主义爆破性的犹太弥赛亚主义,在和当代乌托邦精神重构的理路中,逐渐被社会政治所唤醒,并彰显出极大的批判性力量,他们对现存秩序的批判乃至解构,既是对法西斯极权与独裁专制的消解,也是为了更好地在属于自己的家园诗意栖居,以求改变犹太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生存处境,在犹太社会之外寻求更为公正平等的权利主张。“这一新知识分子阶层不得不到犹太社会之

^① Michael Lowy, *Redemption and Utopia: Libertarian Judaism in Central Europe*,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92, p. 19.

^② 曼海姆则将消解限制、追求自由视作激进无政府主义之千禧年主义立场的范例。参见[德]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③ Michael Lowy, *Redemption and Utopia: Libertarian Judaism in Central Europe*, p. 34.



外寻求生存与自尊,种种边缘化与无家可归的遭遇滋生了一种反叛性的贱民意识。”^①20世纪世俗生活领域构建起自我意志的偶像,犹太知识分子企图剥离作为上帝创造者角色和作为消费者的犹太实践生活之间的勾连,不仅恢复费尔巴哈那种人对自然敞开的多神论理解方式,更着重于重建马克思意义上那种人对社会实践与革命生活敞开的唯物史观理解方式。“正是在所有这些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与文化的因素之共同作用下,在这批中欧犹太知识分子身上,才使得犹太弥赛亚主义与革命的乌托邦这两大文化构型之选择性亲和成为可能。”^②西方左翼思想家对马克思拜物教批判进一步重构的目的,旨在认清资本主义宗教秘密背后的偶像崇拜实质,并依托于社会批判理论内在的犹太传统维度,将其中的偶像批判提炼出来,以扬弃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固化偶像。

西方左翼思想家通过对左翼犹太思想资源的梳理,自觉选择了包含复归与乌托邦二元倾向的末世论式解读,同时超越了单向度的单一批判的阐释路径,将犹太弥赛亚文化在欧洲文化危机时的现实意义呈现出来,并指认了当代乌托邦精神重建、当代乌托邦转向与犹太偶像批判传统之间的联系。

20世纪上半叶的犹太解放思潮中,犹太偶像批判传统与当代乌托邦思想之间,不再是一种单向度的世俗化演绎,而是双向融合与互动的过程,按本雅明的话语表达,乃是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所共同构成的星丛。“宗教弥赛亚的维度不仅从未缺席,而且始终居于他们世界观的核心。”^③犹太传统为当代乌托邦带来深刻的偶像批判利器,而当代乌托邦又将犹太思想的批判传统激发。乌托邦理论从犹太思想传统切入的策略,为重建乌托邦精神重建可能性提供了参考,也为西方左翼革命理论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的理论转向开辟了实践性的路径空间,有利于从总体上理解犹太左翼理论家笔下的当代乌托邦精神,并提供处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新的思考方式。

① Hannah Arendt, *The Jew as Pariah, Jewish Identity and Politics in the Modern Age*, New York: Grove Press, 1978, p. 144.

② Michael Lowy, *Redemption and Utopia: Libertarian Judaism in Central Europe*, p. 39.

③ Michael Lowy, *Redemption and Utopia: Libertarian Judaism in Central Europe*, p. 22.